

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史原貌

吳志良* 金國平*

在中葡兩國史料未通過翻譯為對方歷史研究人員充分掌握之前，一本澳門史的編寫不可能具有科學性和歷史真實性。若不進行此項基礎工作，任何澳門史似應冠以“中國澳門史”或“葡萄牙澳門史”。既然我們承認，澳門是中西文化的交匯地，那麼，她的500年滄桑也應由兩國學者根據雙方的史料來撰寫。這樣，才可能有一部不帶定語的澳門史，即一部具有共識的澳門史問世。

近年來，澳門、中國及葡萄牙對史料的發掘、整理及出版予以了一定的重視，尤其是澳門基金會在此方面起步較早，成績逐步顯現。迄今為止，澳門基金會策劃、出版的史料選題準確、涵蓋面廣泛。最早實施的一項研究計劃是《葡中關係史料彙編》。此套文獻彙編由薩安東主編，漢語部分由金國平統籌，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刊行。迄今為止，已出版兩個系列7冊，另有5冊在印刷中。本彙編為中葡數個世紀交涉史上首項雙語史料彙編研究計劃，它的出版已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治19世紀澳門史的學者必須參閱此彙編”¹。

澳門基金會實施的另一漢語文獻出版計劃是《中葡澳門交涉史料》。該彙編分兩輯，由南京大學澳門史學者黃鴻釗選編。1994年初制定整理計劃，1998年出版。文獻收錄時限始自1849年，截至1946年，內容側重近一個世紀的中葡澳門政治交涉史。尤其是《澳門劃界》一章中所引用的《澳門界務錄》及《香山旬報》，為不易查找的書刊資料，有關民國時期澳門問題的《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及《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較為珍貴。鑒此，澳門基金會正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商討，擬系統整理、出版有關民國時期澳門的史料。

《馬楂多將軍日記》的刊行是澳門基金會文獻出版的另一個重要項目。這一珍貴的歷史文獻，由薩安東從馬楂多將軍後人處訪得。它披露了中葡香港勘界會議的許多內幕。在此一重大歷史事件中，中方勘界大臣高而謙未留下隻字片語。學者可以發現，高而謙似乎因勘界會議的失敗成了千古罪人，遍查晚清民國的傳記字典，均不見其名，因此這一日記顯得尤為重要。香港談判破裂後，移會北京。據日記透

* 澳門史學者

1 普塔克 (Roderich Ptak) : 《澳門及中葡關係》，《華裔學志 (Monumenta Serica)》，第46卷，1998年，第352頁。

露，這不過是給葡方一點面子。連馬楂多將軍本人都不願意前往北京作秀。他在葡京的壓力下，被迫成行。此書為研究中葡香港勘界會議及晚清廣東風起雲湧的政治形勢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此書出版後，引起了學界及一般讀者的濃厚興趣。為方便廣大漢語讀者，澳門基金會已組織翻譯本書，預計將於今年秋天與讀者見面。

目前澳門基金會進行的大型文獻編輯工作是《葡萄牙國立檔案館漢語文書》²。50年代臺灣方豪神甫應葡國著名澳門問題學者席爾瓦·雷戈（Silva Rego）神甫的邀請，往葡鑒定這批文獻，後撰文加以披露³。劉芳對這批檔案進行了詳細的編目。在此基礎上，她與章文欽聯手系統校輯、考訂了全檔，彙編成冊。全書120萬字，16開本，將於今年8月出版。這批舊檔的主體是清朝香山地方當局、前山同知及粵海關駐澳委員與澳門葡萄牙當局交涉中形成的來往函件⁴，為澳門史的深層研究提供了細部資料⁵。這批流落異鄉的檔籍的彙集刊行，將極大地方便有關中外學者查閱。

《葡萄牙國立檔案館漢語文書》的姊妹篇《葡萄牙國立檔案館漢語文書葡譯及葡語回函》（暫名）正在整理之中。我們在撰寫一考證左堂入出澳日期的短文時，因需要查閱現度藏里斯本國立檔案館著名的“漢語文書”，調閱了全部原件，無意中見到了大部分“漢語文書”的葡語翻譯件及回函。這批文獻約2500頁，其時限上起1749年，下至1839年。從其內容而言，較“漢語文書”更為豐富。例如，“漢語文書”中1828年的文獻僅存5、6件，而《漢語文書葡譯及葡語回函》保存了100多件。它不僅包括中國各級政府來件的譯文，同時還有葡方回文的葡語原稿登錄，因此保留了這一時期中葡有關澳門許多重大問題交涉始末的全宗，同時為“漢語文書”的深入研究，尤其是西文人名、地名、船名等考證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據。源自中國官方文件的葡譯散見澳門及里斯本各大檔案館及圖書館，從1929年起《澳門檔案》、《雜俎》、《葡萄牙影像館》等刊物有零星刊載，但如此集中的中國官方文件的葡譯收藏仍屬罕見。據信，這批文獻從未為任何西方或中國學者提及或引用。這批文獻尚無編目，與“漢語文書”混放，且標明為漢語文件，致使西

2. 這批文獻已有中、葡編目，檢索甚便。參見劉芳：《漢語文書葡萄牙國立東波塔檔案館度藏澳門及東方檔案文獻》，澳門文化司署，1997年；及Isaú Santos,《Chapas Sínicas: Macau e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 (Documentosem Chinês)》，ICM, 1997。關於chapa的詞源，可參見金國平：《從Chapa de Prata到Chapa de Ouro》，《澳門研究》，第10期，第97頁。
3. 方豪：《流落於西葡的中國文獻》，《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店，1967年，第1743-1792頁。李維城：《葡京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所藏澳門文件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畢業論文（民國四十二年，未刊）。卜新賢曾利用其中部分資料著有《從葡萄牙國立檔案館所藏文獻簡論18世紀的澳門國際貿易》，《發現史國際會議文件集》，單行本，里斯本，1961年。鄧思平：《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中文史料》，《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9期，第21-22頁。李德超：《臺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度藏之澳門檔案舉隅》，《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9期，第30-44頁。
4. 這批文獻的第一簿題目如下《議事亭發函及中國官員來函登記簿 1749、1807年至1819年晚近函件登錄》。最早的文獻是俞安性5條與張汝霖12條的葡文本。
5. 詳見章文欽、劉芳：《一部關於清代澳門的珍貴歷史記錄——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述要》，載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廣州，1998年，第51-116頁。

人“望盒怯步”，至今無人問津，塵封百年。各位澳門問題學者對此文獻的重要性，相信不會有任何異議。澳門基金會對此批文獻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並決定立即開始整理出版工作。《葡萄牙國立檔案館漢語文書葡譯及葡語回函》的整理工作由金國平、吳志良統籌，目前正在順利進行，預計今夏起將陸續與讀者見面。希望在葡語注釋版問世後不久，能有一漢語精輯本奉獻中文讀者，為澳門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些一手史料。

澳門基金會支持、參加的另一項具有國際意義的文獻整理出版項目，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澳門基金會、廣東社科院歷史所合作編輯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此計劃醞釀於1997年。1998年3月“達成了三方合作編輯出版這套檔案文獻集的協議”，“確定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長邢永福、澳門基金會委員吳志良擔任總策劃，楊繼波副館長、吳志良委員以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鄧開頌教授任總主編，……”⁶本彙編的“目的就是要將明清時期有關澳門問題的漢、滿文原始檔案文獻彙編成冊，以全面反映澳門問題的來龍去脈。彙編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明清兩朝中央機關檔案為主，適量選取《實錄》、《東華錄》及有關官書、方志、明人的筆記資料為輔。同時，收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的《澳門專檔》⁷中的有關資料。彙編採用編年體，計約250萬字，擬分六卷。”至1998年8月，選材工作基本完成。令人欣喜的是，在挖掘澳門問題檔案（明朝檔案和滿文檔案）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中葡交涉始於明朝。以往對明代澳門問題的研究多依賴官書、筆記。偶有引用的檔案材料，也是輯錄在《明清史料》，《籌辦夷務始末》，《清代外交史料》及《清季外交史料》幾部彙編中的資料。“人們一般認為，現世沒有留存明朝澳門問題檔案。更有學者撰文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藏澳門問題檔案最早始於清康熙年間。這次，我們本着高度負責的精神，對館藏3000餘件（冊）明朝檔案逐一進行篩選甄別，迄今已陸續發現了20餘件有關澳門問題的檔案。其時間跨度從天啟三年（1623）到崇禎十五年（1642）；文書種類主要是兵部、都察院、兩廣總督、福建巡撫等衙門的題行稿、題本；內容涉及葡人入居、互市貿易、官員委任等諸多方面，……”“……過去館藏澳門檔案並未系統整理過，這次編輯出版，80%以上材料是第一次公佈，……”⁸

明檔為研究澳門早期的管理模式提供了可靠的資料。譬如，天啟四年九月二十三日（1624年11月3日）的一件兵部題行稿顯示，明朝駐守廣東香山的參將直接管轄澳門，“每歲同巡海道臨澳查閱一次”。關於葡萄牙入居澳門的情況，有一件崇禎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631年9月19日）的兵部題行稿記述如下，葡萄牙人“其初不過以互市來我濠鏡，中國利其歲輸涓滴可以充餉，暫許棲息”

明代澳門檔案的披露為中外學者對澳門早期史的科學研究提供確鑿的史料，對進一步探索澳門早期史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將把國內外澳門史、傳教士在京廷的活動等領域的研究提昇至一前所未有的水平。

6. 《人民日報》，1998年8月12日版第11頁。

7. 《澳門專檔》中公佈的檔案與一史館的檔案原為一個整體。由於我們知道的歷史原因，現分存海峽兩岸。

8. 《人民日報》，1998年8月12日版第11頁。

此次文獻整理工作的另一特色是從滿文檔案中挖掘澳門問題史料。“清太祖努爾哈赤時期，為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於1599年仿照蒙文字母創製了滿文。清入主中原後，定滿語為國語，滿文為國書，因此，在清代形成了大量的用滿文書寫的官文書。現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檔案即達200多萬件，所涉內容包括清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天文氣象，可謂包羅萬象。澳門項目啟動後，滿文專業人員翻閱了近30萬件滿文檔案，到目前為止已陸續選出有關澳門或葡萄牙的滿文檔案30餘件。這近乎萬分之一的檔案可謂彌足珍貴。”它們“分別選自於宮中滿文朱批奏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內務府行文檔等。文件形成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間，而以康熙朝為主。其內容大致可分為4類：一是反映澳門洋船往來情況。由於康熙認為去南洋貿易的中國商民將船、米等物私自賣給外國，不少人還留居外洋，奸弊甚多，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頒佈了禁止中國商船前往南洋貿易的諭令，而租居澳門的葡萄牙人經過幾番努力，獲得了前往南洋貿易的特權，澳門對外貿易由此迅速發展，注冊商船由原有的9艘增至25艘。這一時期，康熙對澳門港洋船的往來情況極為關注，多次垂詢有關西洋船到澳門以及澳門船隻出洋的情況。二是反映西洋人在澳門活動的情況。如西洋人通過澳門往來於中國內地，或通過澳門傳遞信件等。雍正繼位後，下令除通曉技藝的西洋人允許在京效力外，將其他傳教士一律遷往澳門，各省遵令清查遷移，驅逐傳教士到澳門。三是反映清政府對澳門管理的情況。如廣東官員對澳門的巡視；澳門地方發生的各類案件及審理情況，包括澳門洋人與中國居民、洋人與洋人相互傷害的案件等等。四是反映葡萄牙等國西洋人在北京供職及生活的情況。如葡人徐日昇在京供職多年，給康熙講解西方天文曆法，並協助管理在京西洋人眾，頗得康熙賞識，及至去世，康熙特賞銀二百兩、緞十匹及茶葉等物，並派人祭奠。”⁹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現已發現的有關澳門問題滿文檔案，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但其內容廣泛，而且均為清早期檔案，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澳門歷史和中葡關係史獨具特色的資料。”¹⁰

方志和筆記為研究地方史最可靠的資料來源，鑒此，澳門基金會還邀請知名史學家，全面系統地選輯各種與澳門有關的方誌資料和其他官書和私人筆記著述，收入其中。

最近，東方基金會將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進行該館部分中葡關係清檔的葡、英譯工作，以此披露“未刊文獻”。預計出版兩冊，每冊近500頁。然後，再以3或4冊的形式輯入《中葡文獻集》。“《中葡文獻集》為東方基金會準備出版的一套檔案叢書。其目的是編輯出版葡萄牙圖書館及檔案館中的漢語文獻並附之葡、英文評介。”¹¹

從舊粵海關的人事安排上，我們不難看到，它不僅是一個稅收部門，而且是一個直通“龍廷”的政治機構。粵海關的史料對粵澳、中葡關係的研究，具有不可忽

9. 《人民日報》，1998年7月30日版第5頁。

10. 同上。

11. 參見《東方基金會會刊》，第16期，1999年4月，第11頁及《澳門論壇日報》，1999年6月3日版。

視的重要性¹²。澳門基金會與廣東檔案館合作對粵海關老檔進行了整理，其中有關澳門部分已彙編成冊，年內出版。本書彙集的文獻多不見於梁廷楠《粵海關志》一書，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由赫德長期出任總稅務司的中國海關，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洋務運動中扮演過重要的歷史角色。它的影響領域不僅局限與稅收、財經，還左右該時期我國的對外交涉。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檔案，為研究早期中國外交史及中葡關係的重要資料來源。例如，在已刊佈的《海關密檔》中有關於《葡京草約》的詳細資料。為此，澳門基金會組織人力對拱北關的十年報告及年度報告進行了全面的整理並已結集出版。《拱北海關報告彙編》一書收集了1887年至1946年的全部報告，為研究澳門史提供了許多經濟、政治資料。鑒於英中文本不盡相同，澳門基金會正在整理出版英文版。

近年來，澳門基金會致力再版具有公認學術、歷史價值的書刊。例如，1994年，與澳門大學合作重印了《蜜蜂華報》，並於1998年出版了一部研究該報的專著¹³，1995年與教育暨青年司實施了《大西洋國》的重刊計劃，1996年與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出版了《知新報》的影印本。1998年起，與教育暨青年司、澳門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協作再刊《復興雜誌》。已列入再版計劃的還有《雜俎》和《中國叢報》。

1999年12月之後，葡語仍會在政府中使用，也將成為研究澳門史的最主要科研語言之一，因此葡語教學的戰略應作相應的結構性調整。擺在新一代澳門學者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隨着史料的對外介紹，澳門歷史的研究將迅速國際化，中外學界將通過以雙語或多語史料構成的學術對話平台逐漸接軌，對澳門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獲得共識。雖然對澳門基金會出版物的評價褒貶不一¹⁴，但事實證明，澳門基金會的文獻出版方針是正確的。它籌劃、出版的多種文獻彙編及其他出版物，尤其是《澳門法律叢書》，《中國大陸與港澳台地區法律比較叢書》、《澳門叢書》、《濠海叢刊》、《澳門論叢》、《新澳門論叢》以及《澳門總覽》和《澳門百科全書》日益為學界及公眾認同，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無論如何，必須要承認的是，語言隔膜仍為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澳門基金會因而加強雙語及多語出版物，努力為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作出貢獻。漢語文獻“民主化”了，不再成為少數漢學家的特權。反之，我國學人也更加容易接觸西文資料。

誠然，尚有一些重要研究領域未得到涵蓋，有待開發。若能對葡語中有關孫中山的史料加以全面的鉤稽，定會為有關他早期革命活動的研究及民國史的探討帶來新風。澳門基金會正在刊印的戈麥斯·貝薩陸軍上校（Coronel Gomes Bessa）所著《民國創立中的澳門（A Implantação da República da China passou por Macau）》一書為此方面的新嘗試。另外，《薩拉查檔》及《國際國防警察檔》為研究澳門現代史

12. 朱榮基：《廣東舊海關檔案史料價值初探》，《檔案學通訊》，1981年，第1期，第38-42頁。

13. 程曼麗：《蜜蜂華報》，澳門基金會，1998。

14. 魏美昌：《論一九九年前後澳門文化特徵之保留及發展》，《行政》，第10卷，第1期（總第35期），1997年3月，第231頁上對澳門基金會及東方基金會出版物的評價為“澳門基金會及東方基金會向來亦有不少出版關於澳門題材的書籍，儘管學術水平還不高。”

的重要資料來源。中外學者已開始將上述檔案引入澳門現代史的研究¹⁵。通過上述檔案中保存的豐富文、圖資料，我們可以了解到何賢先生在澳門60年代至80年代的政治史上幾次重大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中文檔案尚未開放的情況下，《薩拉查檔》及《國際國防警察檔》對澳門現代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此外，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收藏的大量中葡外交交涉中形成的檔案亦十分重要。薩安東近期的研究很好地利用了這批資料，因此他的著作即可作為論文閱讀，又可作為簡便的史料來源參考、引用。外交部檔中，對研究粵澳關係最重要的是《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檔》。其文獻時限為1904年至1948年，共計39冊，15函盒，305札文獻。這批檔案不僅有葡國機構的內部公函，同時保留了許多當時中外報刊雜誌及書籍中的有關資料，對廣東清末、民國初年的歷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文獻價值¹⁶。

從歐美有關澳門的文獻資源來看，尚有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1580年至1640年，葡西共事一王，而這60年正是澳門發展的初期。這一時期形成的許多重要文獻¹⁷，今存西班牙塞維利亞東西印度¹⁸檔案館、西曼卡皇家檔案館、馬德里國立圖書館、西班牙國立檔案館、西班牙皇家科學院等機構。梵蒂岡圖書館及耶穌會檔案館收藏有大量有關澳門的漢、西文資料。上述資源的調查整理有待進行。早期耶穌會士及其他教團傳教士在中國境內刻印的漢、拉丁等文書籍在中國無全面的收藏，初版尤其難見，但此類書籍在歐美各大圖書館、檔案館有較豐富的收藏。這批書籍大部分是西方傳教士與中國文人墨客合作的產物，且以漢語在中國境內刊行，應被視作中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對這批書籍在歐美的收藏作一全面的調查，編寫一題解目錄，從國外複製中國無收藏的書籍或不同版本送存中國國家圖書館並在澳門留存一份。利瑪竇、羅明堅越“關閘”，入肇慶，“長征”華夏，但根在澳門。

史料的發掘、整理及出版，是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除了必要的財政資源外，尚需要能迅速選定確有學術、歷史、文獻價值的項目的學者和管理人員作為決策人。多語種文獻的出版為撰寫一部科學的澳門近、現代史的基礎，因此，該項工作應該持之以恆。祇有充分挖掘整理澳門史的原始檔案文獻，才能體現澳門史的原貌，才能正確評估澳門史的意義，才能真正體現澳門應有的文化價值。

15. 吳志良在其《生存之道》一書中已有引用。澳門基金會近期發行的《澳門——她的兩個過渡》的作者（Fernando Lima）也利用了這些檔案。

16. 從這一檔中輯出發表的有東方葡萄牙學會《東方追憶》叢書之一《澳門及戰後中國》及之十二《通過廣州看戰爭——中日戰爭期間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瓦思克·馬爾廷斯·莫爾加多的報告》。此書的漢譯本將由澳門基金會於年內出版。

17. 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所藏《耶穌會會士在亞洲》這一珍貴鈔本的大部分原件今散存西班牙數個機構。

18. 東印度即葡屬印度。西印度即拉丁美洲。